

# 商族起源研究綜述

13-23

## A Summary of Studies in the Origins of the Shang Clan

朱彥民 (Zhu Yanmin) \*

商族起源問題，自西漢司馬遷始，兩千年來諸說攪繞、莫衷一是。近現代學術界更是熱衷於這一題目的討論。

隨著殷墟考古發掘和研究的進展，一些考古學者就提出了探索早於晚商的早商文化及商文化來源的問題。為在考古學上尋找殷墟文化的來源，李濟曾經提出「先殷文化」的假說，認為小屯所發現的黑陶文化（即龍山文化）代表一種先殷文化。<sup>1</sup> 同時李濟也提出過「先商」和「原商」的概念。<sup>2</sup> 對於早於殷墟的考古學文化，梁思永、尹達等也作了較多的探索，認為殷商文化在許多方面都是繼承龍山文化的文化因素。<sup>3</sup> 再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曾派李景聯等赴文獻中稱

為「南亳」的豫東地區進行考古調查，尋找先商文化和「南亳」的蹤跡，雖然並沒有什麼線索，<sup>4</sup> 但是這種探索正是將歷史文獻與考古發現結合在一起以探求較早考古學文化的一種正確做法。

上個世紀 50 年代以來，鄭州二里岡和商城遺址的發掘又確定了早於殷墟的商代前期文化，而早於二里岡的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址的大規模發掘之後，商文化的更早來源也即先商文化的問題又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更多學者的關注。特別是早於商代文化的二里頭文化、河南龍山文化、岳石文化、山東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及遼西紅山文化等的發現和研究，極大地促進和帶動了關於商族起源研究活動的開展。於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學說、

\* 作者為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專職研究人員，歷史學院副教授，歷史學博士。

1 李濟，〈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層〉，《李濟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但同時李濟又否定了這一假設：「黑陶文化似乎也可認為先殷文化——不過就我們現在所知的事實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黑陶文化與殷商文化的準確關係，究竟它是殷商文化的一個老底子，還是一個與殷商並行的完全不同的文化？要是專從陶器的變化上說，這第二個假設，似乎近於事實所表現的。小屯所出殷商期的陶器，在土質、形制、色澤上均表示了與黑陶期陶器顯然不同……所以就陶業講，殷商文化是受了黑陶的若干影響，但它的基本成素，卻另有所自。……考古的事實，卻說明了這一系的文化，不是黑陶文化所能代表的。」（李濟，〈小屯殷代與先殷陶器的研究〉，同上書）但是直到晚近一些時候，仍有學者把早於殷墟期的龍山文化稱為「先殷期」文化，如石璋如稱：「由地層的堆積顯示，這裡在未建基之前，是先殷期文化遺存相當密集的地帶，從殷墟第五次到第七次發掘的時候，稱這層堆積為小屯的龍山文化層。」（石璋如，〈殷代地上建築復原第四例——甲六基址與三報二示〉，《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與考古組」，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年，頁2。）

2 李濟，〈中國文明的開始〉，《中國現代學術經典》之《李濟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389、394、405。當然，李濟的「先殷文化」、「先商」和「原商」概念與後來考古學界討論的「先商文化」是含義不同，李濟所謂的「先殷文化」和「先商」是指早於殷墟文化的考古學文化，在時空範疇上包括現在考古學界討論的「先商文化」和「早商文化」乃至於「中商文化」。

3 梁思永，〈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梁思永考古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頁150；尹達，〈中國原始社會〉，《尹達史學論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04、106、182。

4 李景聯，〈豫東商丘永城調查及造律臺黑堦堆曹橋三處小發掘〉，《中國考古學報》第2期，1947年。

觀點不斷湧現出來。

為了使這一研究能夠進一步的深入，有必要將其中的主要觀點綜述如下：

## 一、西方說

西方說即指陝西說，為出現較早的傳統觀點。《史記·殷本紀》說契「封於商」，湯「始居亳，從先王居」，雖未明言在西方，但在〈六國表序〉又云：「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常用雍州兵，漢之興自蜀漢。」很顯然，司馬遷認為商族同其他民族一樣起源於西方。

至於此西方究在何處，後世學者由於分別對「商」、「亳」的解釋不一，而對商族的起源地形成兩種不同的意見：

### （一）太華之陽

《史記·殷本紀》言契封於商，後人注釋此地以太華之陽。如〈書序〉孔疏引鄭玄語：「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帝王世紀》也稱：「商契始封於商，在禹貢太華之陽，今上洛商是也」。（均見裴駟《史記·殷本紀》集解引）又《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高所封也。」（《史記·殷本紀》正義引）都認為商人起於華山之南。

### （二）京兆杜陵

司馬遷所言「湯起於亳」，「從先王居」而始居於

「亳」，也未言明究在何處。後世學者演成「杜亳說」。許慎《說文解字·高部》：「亳，京兆杜陵亭也。」徐廣《史記音義》亦云：「京兆杜縣有亳亭。」（《史記·六國年表序》集解及《史記·封禪書》索隱引）是皆稱「湯起於亳」之「亳」在今陝西省長安縣東南。

雖然漢晉唐間學者對商族起源的具體地望認識不一，但他們都認為應是西方。因此可視為傳統的西方說觀點。這種觀點對後世學者影響很大，從者甚眾。如皮錫瑞、魏源、俞正燮、陳壽祺<sup>5</sup>等都支持和信從西方說。現當代學者受傳統觀念的影響，信從此說者仍不乏其人。如蒙文通認為陝西境內的商州西亳，「為契之舊居」。<sup>6</sup>顧頡剛認為：「商之本封雖在今陝南，而商之別封竟至今隴西。」<sup>7</sup>「當時亳王區域奄有今渭北之三原、興平與渭南之長安等地。合之〈殷本紀〉注，則商人始基在渭水、丹水兩流域。」<sup>8</sup>荆三林認為商族發源於太華之陽的洛河丹河上游地區，以後逐漸向豫中、豫東發展，至成湯時到達今山東曹縣和江蘇省徐州市一帶。<sup>9</sup>黃競新對甲骨卜辭與經史文獻的考證，也認定殷商民族起源於陝西境內。<sup>9</sup>

張國碩從考古學角度曾主商族起源於晉南說，但他又認為商族的發源地在關中東部與山西鄰近地區，陝西客省莊二期文化的東部類型即是商族最早的物質文化遺跡。<sup>10</sup>近有學者從甬式鬲的演變分析，也認為客省莊文化是商文化的淵源，商人發源於今陝西省境內的渭水流域一帶，經過相當長時間的發展之後，才開始遷徙到山西、河北、河南等地。<sup>11</sup>

## 二、東方說

5 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卷30；魏源《古書微》，卷6《湯誓序發微並考三亳都》；俞正燮《癸巳類稿》，卷1《湯從先王居義》（皇清經解續編本）；陳壽祺《左海經辨·八遷五遷辨》（引自顧頡剛，〈殷人自西徂東筮記〉，《甲骨文與殷商史》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6 蒙文通，《古史甄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頁103。

7 顧頡剛，〈殷人自西徂東筮記〉，《甲骨文與殷商史》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8 荆三林，〈試論殷商源流〉，《鄭州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

9 黃競新，〈從卜辭經史考殷商氏族源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論文（1970年度）。

10 張國碩，〈商族的起源與商文化的形成〉，《殷都學刊》1995年第2期。

11 銅官，〈甬式鬲與先商文化〉，王光鎬主編，《文物考古文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

## （一）豫東魯西南說

首倡此說的是王國維。與司馬遷主張古之帝王多起事於西方說恰恰相反，王國維認為：「以地理言之，則虞、夏、商皆居東土，周獨起於西方。」王氏在〈說商〉、〈說亳〉等文中考證了商即今河南省商丘、亳在今山東省曹縣。<sup>12</sup>此後，商人起源於東方之豫東魯西南說得到了很多學者的回應和支持。

郭沫若認為商族起源於豫東魯西南地區：契居之蕃，在今山東滕縣，昭明所居之砥石在今河北省涿水，相土之商丘在今河南商邱一帶。<sup>13</sup>龔維英認為，商族屬東夷鳥圖騰集團，今之商邱即古之商地，因相土時商人聚居此地而得名。<sup>14</sup>

商族起源於豫東魯西南說，頗得考古界一些人士支持，如吳秉楠、高平、<sup>15</sup>許順湛、<sup>16</sup>李仰松、<sup>17</sup>孫飛、<sup>18</sup>安金槐、<sup>19</sup>鄭伯昂、<sup>20</sup>楊亞長、<sup>21</sup>楊寶成<sup>22</sup>等，大都主張龍山文化造律台類型（即王油坊類型）為先商文化，認為商族起源於豫東魯西南一帶。近年來樂豐實認為，鄭州南關外下層早期商文化的直接來源，應是分布於魯豫皖一帶的岳石文化。<sup>23</sup>張光直也認為，先商文化應在

河南最東部、山東西部和安徽北部這一地區內，他構擬的先商文化面貌一方面與二里頭類型的夏文化有某些相似之處，另一方面又構成了大汶口和龍山文化向商朝過渡的一個階段，殷商文明中與統治階級的宗教、儀式、生活和藝術有關的重要文化因素，起源於東部沿海地區。<sup>24</sup>

## （二）濮水流域說

創立此說者是田昌五。他從音韻學考證認為，《史記·殷本紀》所說「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地在河濟之間的濮水流域；商族發祥於濮水流域下游地區以後，渡河向北發展至漳水流域，章、商古通用，商族在此得族名；濮水流域是商人最早居住地和族源地。<sup>25</sup>

方輝從考古學角度支持此說，他也以商文化南關外期的陶炊器鬲、甗與漳河型、輝衛型同類器的有明顯差別，認定商文化起源於岳石文化；以岳石文化為主的濮陽地區是南關外期商文化的來源地。<sup>26</sup>

## （三）山東半島說

李濟曾指出山東是中國文化的聖地，不僅因為孔夫

12 王國維，〈說商〉、〈說亳〉，《觀堂集林》，卷12（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13 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1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

14 龔維英，〈商的由來淺說〉，《中學歷史教學》1985年第2期。

15 吳秉楠、高平，〈對姚官莊與青坨堆兩類型遺存的分析〉，《考古》1978年第6期。

16 許順湛，〈夏代文化的再探索〉，《河南文博通訊》1979年第3期。

17 李仰松，〈河南龍山文化的幾個類型——談夏文化的若干問題〉，《第一次考古學會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18 孫飛，〈論南亳與西亳〉，《文物》1980年第8期。

19 安金槐，〈試論商代「湯都亳」與「仲丁遷隰」〉，《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

20 鄭伯昂，〈先商文化及其淵源與發展新探〉，《商丘師專學報》1985年第2期；〈論紅山文化非先商文化——商先起源於幽燕論商權〉，《商丘師專學報》1987年第1期。

21 楊亞長，〈試論商族起源與先商文化〉，《北方文物》1988年第2期。

22 楊寶成，〈商文化淵源探索〉，《華夏文明》第1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

23 樂豐實，〈試論岳石文化與鄭州地區早期商文化的關係兼論商族起源問題〉，《華夏考古》1994年第4期。

24 張光直，〈早商、夏和商的起源問題〉，《華夏文明》第1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個關鍵問題〉，《中國青銅時代》（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古代中國考古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359。

25 田昌五，〈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先商文化探索〉，《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史論》（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

26 方輝，〈「南關外期」先商文化的來龍去脈及其對夏、商文化斷限的啓示〉，《華夏文明》第3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子誕生於斯，是先秦時期中國文化的中心，而且山東的龍山文化很可能也是商文化發軔的所在。<sup>27</sup> 佟柱臣也從考古學角度提出，可以把山東地區之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系統作為探討包括商族在內的夷人族源的材料。<sup>28</sup> 王玉哲也依據文獻考證了商族最早居於山東瀕海地區、起於東方的夷人集團，並把先商文化和豫東龍山文化、山東龍山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聯繫在一起，認為山東龍山文化中有一支進入河北中部遊牧於易水、漳水一帶，夏末居於冀南魯西，最後西向滅夏建立了商朝。<sup>29</sup>

胡厚宣認為在中國古代文獻傳說中，少皞即是契，為商的始祖，太皞即是契之父帝嚳；少皞以摯鳥為名，他立國時，正當鳳鳥來臨，所以他要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sup>30</sup> 徐中舒指出商民族早期活動地區在今山東半島的齊魯一帶。《商頌》自言商人出自玄鳥，《左傳》昭公十七年剡子講少昊氏以鳥名官中有玄鳥氏，認為商先祖為少昊帝族之一。<sup>31</sup> 劉起鈺曾分析《楚辭·天問》所問，也認為其中「商族的古史神話傳說從舜開始，和《國語·魯語》所記商族最早的宗神是舜相符合，證實古史傳說中確以舜為商祖。」因而「由這位稱為東夷之人的舜，作為東方夷商族的祖先，是合於歷史實情的。」<sup>32</sup> 孟世凱也認為商族與少昊族有密切的族源關係，可能是從少昊族中分離出來，自東向西遷徙到河南商丘一帶後，才以地名為族名。<sup>33</sup> 景以恩指出契與相土所居最早的商丘之地不在河南，而在今天的山東壽光

市境內，商族起源於齊東一帶。<sup>34</sup>

### 三、北方說

北方說又可分為渤海灣說、冀東北說、易水流域說、北京說、冀中南說和豫北說等。

#### (一) 渤海灣說、冀東北說

徐中舒又認為商族起源於環渤海地區，並從其遷徙之跡看出由東漸西之勢。<sup>35</sup> 胡厚宣認為殷人崇鳥，今東北沿海一帶尚鳥，知商人源於渤海灣一帶。<sup>36</sup> 李亞農也認為殷人的發祥地在易水流域和渤海灣。<sup>37</sup> 翦伯贊認為，在新石器時代商族已廣泛地分布於渤海沿岸，環渤海而居者皆為商族。<sup>38</sup> 王明閣根據渤海沿岸的少數部落中曾廣泛流傳鳥卵降生的神話，商先人生於鳥卵，因而推則商族也起源於渤海沿岸一帶。<sup>39</sup>

楊錫璋根據考古發現材料，由論證殷人尊東北方位，而推測其可能與商族起源地有關；認為「先商文化時，山東地區為岳石文化，大清河以北為夏家店下層文化，相土活動的地區只能處於上述二者之間的天津以南的渤海灣地區。」「商族在整個先公時期一直在這一地區活動。因此我們推測，商族的起源地，可能是在這一古黃河下游地區（古黃河自天津渤海灣入海）。」<sup>40</sup> 近年韓建業探討先商文化漳河類型的來源，認為應該注意

27 李濟，〈中國文明的開始〉，《中國現代學術經典》之《李濟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388。

28 佟柱臣，〈新的發現、新的材料測定對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提出的新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1期。

29 王玉哲，〈商族的來源地望試探〉，《歷史研究》1984年第1期。

30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鳥圖騰的遺跡〉，《歷史論叢》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

31 徐中舒，〈殷商史中的幾個問題〉，《四川大學學報》1979年第2期。

32 劉起鈺，〈我國古史傳說時期綜考〉（上），《文史》第28輯（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21。

33 孟世凱，〈商族源和相關的問題〉，《徐中舒先生九十壽辰紀念文集》（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

34 景以恩，〈商族源於齊東新探〉，《學術月刊》1996年第10期。

35 徐中舒，〈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國學論叢》第1卷第1期，1927年；〈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冊，1930年；〈再論小屯與仰韶〉，《安陽發掘報告》第3期，1931年；〈殷商民族及殷王世系〉，《先秦史論稿》（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頁56。

36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鳥圖騰的遺跡〉，《歷史論叢》第1輯，1964年。

37 李亞農，《殷代社會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38 翦伯贊，〈商族的起源與古代國家的建立〉，《先秦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130。

39 王明閣，《先秦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40 楊錫璋，〈殷人尊東北方位〉，《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冀東北地區，以河北任邱啞叭莊龍山文化遺址為據分析了這種可能性。<sup>41</sup>

### （二）易水流域說、北京說

丁山以蕃、亳、蒲音近同的關係，認為契所居蕃在滄水支流之博水流域，「商人發祥地決在今永定河與滄河之間。」又說殷人起自今河北省泇水流域，其遊牧所至，北抵燕薊易水，南抵商丘，東抵鄒魯，西抵河內武陟，其蹤跡大抵沿衡漳黃河兩古瀆，逐漸南下，顯然為東北民族燕亳山戎之類。<sup>42</sup>張蔭麟也引述這種說法。<sup>43</sup>翦伯贊認為商族最初在渤海沿岸，至王亥時遊牧於易水流域，並以易州發現商代句兵相證，甚至認為「商族之人種來源，與周口店山頂洞的文化創造者，似有若干關係。」<sup>44</sup>

蘇秉琦研究鬲由罍形袋足器而來的演變，有兩條發展路徑，一路呈銳角襠的袋足鬲，一路呈高圓丘形襠的聯襠鬲，前者似是曾活動於西遼河與海河北京地帶的包括商人在內所走過的道路；燕山南北地區在夏商時期的燕文化和商人有著密切的文化聯繫，是商人的後方。<sup>45</sup>近來曹定雲指出文獻中有稱殷商始祖「契」為「少皞契」者，少皞部落遷居山東之前曾居於軍都山和燕山附近，契所降生地在今北京地區，燕山一帶是商族的發祥地；燕人乃玄鳥氏族之先民也，商族根於太皞部族，商文化淵源於紅山文化。<sup>46</sup>

### （三）冀中南說、豫北說

力創此說者為鄒衡。鄒氏以大量考古學資料作類型學分析，指出殷商文化來源於先商文化漳河型，而漳河型先商文化主要源於河北龍山文化潤溝類型，同時也受到周圍其他文化尤其是山西境內的古文化的影響；又通過對文獻中商族先公居地的考證，認為商人最早活動於河北省南部大片平原上，其中心地點應在滹沱河與漳河之間，稍後則漸次向南擴展，直到成湯之時才渡河佔領鄭亳（鄭州）。<sup>47</sup>

贊同和補充此說者大多為考古學家。如嚴文明則認為位於豫北冀南的「後岡二期文化有可能就是商族祖先的文化」。<sup>48</sup>李伯謙認為先商文化是指湯滅夏以前商族（或以商族為主體）創造和使用的文化，以「下七垣文化」的概念代替鄒氏的先商文化；而豫北冀南下七垣文化的來源，既吸收了後岡二期文化的一些因素，也繼承其他考古學文化傳統，尤其是與太行西麓的龍山期文化關係密切。<sup>49</sup>宋豫秦、雷興山認為，與二里岡下層文化因素完全一致的分佈於冀南豫北地區的漳河型、輝衛型文化應該就是商先公時期的先商文化。<sup>50</sup>沈勇也認為，太行山東麓是商族的策源地，其地域北抵易水、南抵黃河，西依太行山脈，東部抵至魯西，約當古冀、豫二州，分佈於這裡的相當於夏朝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即先商文化）是商文化的前身。<sup>51</sup>

從文字學、文獻學角度論證此說者也不乏其人，如姜亮夫以文字演變研究認為，「殷」乃「夷」字之形訛之變，夷——尸——𠂔——般，豫北殷地乃是殷商人們

41 韓建業，〈先商文化探源〉，《中原文物》1998年第2期。

42 丁山，《商周史料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17、31；〈由三代都邑論其民族文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1分冊（1935年）。

43 張蔭麟，《中國史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12。

44 翦伯贊，〈商族的起源與古代國家的建立〉，《先秦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128。

45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頁14、15；華泉，〈張家口地區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考古研究學術討論會側記〉，《史學集刊》1982年第4期。

46 曹定雲，〈北京乃商族發祥之地〉，《北京社會科學》1998年第1期；〈商族淵源考〉，《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

47 鄒衡，〈試論夏文化〉；〈論湯都亳及其前後的遷徙〉，《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48 嚴文明，〈龍山文化和龍山文化時代〉，《文物》1981年第6期。

49 李伯謙，〈先商文化探索〉，《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50 宋豫秦、雷興山，〈文化因素分析與先商文化探索〉，《中國文物報》第51期，1989年12月29日。

51 沈勇，〈商源淺析〉，《文物春秋》1990年第3期。

的根據地。<sup>52</sup>馬世之也同意商族策源地在漳水流域，後來才遷到商丘一帶。<sup>53</sup>孫森指出今河南商丘稱商是極晚之事，商之得名於滴水，滴水即漳河，只有把商族起源定於漳水流域，才與文字學、考古學和文獻記載相一致。<sup>54</sup>劉緒也認為商人的母系屬北方部族，契以後的子姓封國也大部分在北方；和商有關係的另一些部族都分布在古黃河以北的河北省中南部，而且有的商先公就活動在這裡；商族的發祥地在河北省中南部及其鄰境地區。<sup>55</sup>李江浙也同意鄒論，但他認為河北龍山文化邯鄲澗溝遺址，是秦族路俗氏遺存，而商族是從路俗氏中分離出來的，商族是起源於大費秦族。<sup>56</sup>

#### 四、東北說

此論為傅斯年所力倡。他一反傳統觀點，認為商族發跡於東北，建業於渤海與古兗州，滅夏以後而佔有中原；又從東北各原始部落中普遍存在的卵生感生神話，及《詩·商頌》中相土與海外的關係、《楚辭·天問》中王亥王恒故事的發生地望、《山海經》中帝俊（即商人先祖帝嚳）實據有東北境域，說明商族起源於東北。<sup>57</sup>

此前，王國維雖主張商起於東方說，但他也曾說過：「嘉興沈乙庵先生語余，箕子之封朝鮮事，非絕無淵源，頗疑商人於古營州之域，夙有根據，故周人因而封之……」<sup>58</sup>顧頡剛為之補證曰：「殷商疆域頗恢廓於

東北，是以王亥托於有易，北伯位於涑水，皆在今河北境；……觀於周室克殷以後，封建懿親以自屏藩，東有齊魯，北有燕衛，未始不因其為殷之重要地域，若此言不虛，則《商頌》中『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之語殆得一佐證矣。」又云「比較夏代的疆域，惟有東北方是添出來的，所以相土會得到海外有截，王亥會得遊牧至有易，箕子會得退保朝鮮，而殷墟中掘出來的東西有咸水貝和鯨魚骨。」在其著作中，顧氏多次論證有卵生神話之殷商民族與東北之密切關係，或者起於遼寧和河北之間的觀點。<sup>59</sup>但後來顧氏改變此說而持西方說。勞榘從文獻「九丘」的地理考證，認為夏民族應在西方，丘之稱只限於東方民族，而商民族傳說與東北地區古代民族傳說相同，商族淵源或者與東北地區有關。<sup>60</sup>翦伯贊主張殷族王亥活動易水流域，季時又向東南渤海灣一帶移徙，一部分走向遼東半島乃至朝鮮半島；而商族較早的史跡「契居蕃」、「昭明居砥石」皆應在遼東。<sup>61</sup>張蔭麟又認為，記載相土功業的頌詩「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海外說不定就是遼東或朝鮮；後來商朝亡後，箕子能逃入朝鮮而歷世君臨其地，莫不是因為商人原先在那裡有些根據？」<sup>62</sup>

後來學者則是以文獻和考古學相結合論證此說。金景芳指出，文獻中契稱玄王，玄為北方，玄王即北王；蕃與毫、蒲古音通假，契居蕃就是北方燕毫之地；昭明居之砥石，「在塞外遼水所生」的遼水源頭，即內蒙古

52 姜亮夫，〈夏商兩民族若干問題彙述〉及〈殷商辯名〉，《古史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53 馬世之，〈商族圖騰崇拜及其名稱的由來〉，《殷都學刊》1986年第1期。

54 孫森，〈古商丘考——商族起源地探討〉，《先秦史研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商名稱的由來及商族起源〉，《殷墟博物苑苑刊》創刊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55 劉緒，〈從夏代各部族的分布和相互關係看商族的起源地〉，《史學月刊》1989年第3期。

56 李江浙，〈商族起源新考〉，《北京社會科學》1989年第3期。

57 傅斯年，《東北史綱》（南京：中央研究院，1932年）；〈夷夏東西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慶祝論文集》，1932年。

58 王國維，〈商三句兵跋〉，《觀堂集林》卷18（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59 顧頡剛，〈古代地理研究講義乙種·王亥王恒等語與有易之關係案語〉，〈殷人自西徂東札記〉附記引，《甲骨文與殷商史》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古史中地域的擴張〉，《禹貢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34年3月16日；《中國疆域沿革史》（與史念海合著）（重慶：商務印書館，1938年）；顧頡剛，〈商王國的始末〉，《文史雜誌》第1卷第1期，1941年3月1日；顧頡剛，〈中國古代史述略〉，《學術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1月1日。

60 勞榘，〈由九丘推論古代東西二民族〉，《禹貢》第1卷第6期，1934年。

61 翦伯贊，〈殷族與史前渤海系諸氏族的關係〉，《群衆週刊》第7卷第5期，1942年。

62 張蔭麟，《中國史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12。

昭烏達盟克什克騰旗的白岔山；商湯滅夏以前，勢力並沒有到達今河南中部，商族起源於東北、起源於遼西。<sup>63</sup>張博泉進一步指出，與殷人始祖契有關的有娥氏在東北西南幽燕境內；商族先公活動於「自易水至北狄」的殷土，即今遼河以西、今河北易水以北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時間、地域與文化特徵與殷人先世歷史符合，且在遼西分布者早而在河北分布者晚，漳河型文化很可能是夏家店下層文化進入中原後向早商文化發展的中間環節。<sup>64</sup>蘭新建指出傳說中顓頊、帝嚳皆為商人祖先，他們主要活動於東北；文獻中的燕亳與燕、殷、隱等，代表商人所居之廣泛的地域；商人的祖先最早在東北地區西南部，即內蒙古昭盟和遼寧西部及河北北部地區；紅山文化中出土的玉鳥，可與商人起源於玄鳥的傳說相印證；夏家店下層文化在發展過程中的南漸，就是商人的南下。<sup>65</sup>干志耿、李殿福、陳連開等合作，提出「商先起源於幽燕說」，其依據是：商先公活動在今長城兩側、燕山南北的幽燕之域；契所居蕃，昭明所居砥石以及舜（俊）都蒲阪、帝嚳（夔）都亳都在今北京以北、燕山兩側；自上甲微至成湯滅夏以前，商族開始南下，發達於河濟之間；紅山文化、後紅山文化（東山嘴類型、牛河梁類型）是先商文化的淵頭，夏家店下層文化南漸形成了先商文化。<sup>66</sup>黃中業把紅山文化的後繼者——小河沿文化歸屬為商契部族文化遺存，已完成由母系向父系氏族社會的過渡，也把此後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南漸當作商族先人入主中原的表現。<sup>67</sup>晁福林在分析了紅山文化與殷商文化的相似因素，諸如宗教祭祀、玉器造型、女性崇拜、骨骼人種等，認為紅山文化區域偏南的某個部分，可能是上古時代有娥氏活動的地方；從時代

上來說，紅山文化的下限已經接近於夏王朝，而簡狄所生的契，在文獻記載中與禹約略同時；遼西、冀東北地區是商族的發祥地。<sup>68</sup>最近郭大順也指出夏家店下層文化是先商文化構成的三大文化系統（另兩個為二里頭文化、岳石文化）中開始年代最早、延續時間最長的一支，夏家店下層文化中陶器群特徵，如繩紋灰褐陶甗、鬲作為主要炊器，加上深腹罐、寬沿大口盆、淺盤高柄豆等，與作為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的陶器組合和特徵甚為接近；夏家店發達的文化特徵彩繪陶器上的饕餮紋、夔龍紋、目雷紋等，酷似商代青銅器上的同類花紋主題等等。<sup>69</sup>

## 五、晉南說

首先明確提出晉南說者是李民。他認為商族的策源地在今山西省永濟縣和陝西省華縣之間，以後沿黃河北岸向東遷徙，昭明時已達今沁水一帶，相土時遷到豫東並在那裡興旺發達起來；山西南部是商族的搖籃。<sup>70</sup>近年李民與張國碩合作，認為夏、商、周三族同源，對商族的起源有了新認識：客省莊二期文化的東部類型為商契曾邦的文化遺存，商族始於關中東部後又遷至晉南，下七垣文化來源於晉南、晉中地區的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光社文化，又說下七垣文化與客省莊二期文化也有一定的淵源關係。<sup>71</sup>

姚政從文獻考證認為，有娥氏在晉南，娶有娥氏女簡狄而生商族契的帝嚳部族也在晉南，因此商族的發祥地在今山西南部；不過他認為商族原是黃帝族支族，最早活動於陝北的黃土高原，至帝嚳時從黃帝族中分離出

63 金景芳，〈商文化起源於我國東北說〉，《中華文史論叢》第7輯，1978年。

64 張博泉，〈關於殷人的起源地問題〉，《史學集刊》1981年復刊號。

65 蘭新建，〈先商文化探索〉，《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

66 干志耿、李殿福、陳連開，〈商先起源於幽燕說〉，《歷史研究》1985年第5期；〈商先起源於幽燕說的再考察〉，《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

67 黃中業，〈從考古發現看商文化起源於我國北方〉，《北方文物》1990年第4期。

68 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會變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64、65。

69 郭大順，〈北方古文化與商文化的形成〉，《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頁113-115。

70 李民，〈關於商族的起源〉，《鄭州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

71 李民、張國碩，《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來，並跟隨黃帝部族從陝北遷到晉南後才形成商族。<sup>72</sup>鄭傑祥從商族與周族同源，文獻中有娥之虛在蒲州的記載，也認為商族起源於山西西南部的永濟縣一帶。<sup>73</sup>陳昌遠也持商源晉南說，其依據為：商族是以玄鳥為圖騰的，晉南古部族也以鳥為圖騰；「商」字有鳳鳥圖騰崇拜含義，商字下部似穴居形，而穴居是黃河流域黃土高原的民居特徵；商人是虞舜之後，舜和其他部族傳說之活動中心在晉南；契母簡狄為有娥氏之女，有娥氏在晉南蒲州；「契居番」、「湯居亳」，「番」「亳」同為一體，契居番、湯居亳應在山西垣曲縣古城鎮的商城遺址。<sup>74</sup>

晉南說也得到了考古學界的支持，如鄒衡認為先商文化漳河型的三個主要來源中，若就地區而言有兩個在山西省，先商文化漳河型中的不少因素是從山西省來的。<sup>75</sup>李伯謙也認為先商文化更早的淵源，除了後岡二期文化，還吸收了較多的山西龍山文化因素。<sup>76</sup>張光直則主張河南西北部的一支地方性龍山文化，便是日後殷商文化的前身；「商代早期遺址，至少到目前為止主要發現於河南西北部和山西東南部，而以偃師二里頭遺址為其最重要的中心。現在看來，商文明發祥於這個地區。」<sup>77</sup>王克林指出山西漳河流域和太行山一線的龍山晚期文化和夏商時期的文化遺存，有自身文化發展系統，又有濃厚地域特徵的陶器，是有別於伊洛地區的另一類型，很可能就是商族早期或先商文化的遺存，因此認為商族發祥於晉冀接壤的太行山南端西麓，今晉東南漳水流域或往北的太行山一線。<sup>78</sup>

## 六、中原說

這一觀點主要存在於一些考古學者論著之中，但多是從宏觀角度泛泛而論。如安志敏認為，商文明是在河南龍山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是黃河流域首先出現的階級國家，已擁有城市、文字和金屬器，並形成了文明發祥的中心，逐漸向周圍地區擴大影響。<sup>79</sup>高廣仁、邵望平比較了海岱地區和長江流域史前時期埋葬中的龜、犬，與殷商時代龜為靈物、以犬為犧牲這兩個典型文化現象之間的關係，認為商殷文化是本地起源的，又是多根系的。<sup>80</sup>趙芝荃主張豫北、冀南地區的二里頭文化為先商文化。<sup>81</sup>

程德祺認為，河南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與商文化，有一脈相承的聯繫，應是商族先後所創造，河南是商族及其先人活動的中心區域；二里頭文化是商族文化，而山東龍山文化為夏文化，夏商鄰河而居，夏東商西，夏居下游，夏、下音同相通，商居上游，商、上音近相通，商可能是上方之人的意思。<sup>82</sup>

## 七、夏商周三族同源說

王國維主張商族起源於東方說，但在其著作中也曾有過夏商周三族同源的說法，如他根據《世本》、《帝系姓》皆以殷周同出帝嚳，主張「以族類言之，則虞夏皆顓頊後，殷周皆帝嚳後，宜殷周為親。以地理言之，

72 姚政，〈論商族的起源〉，《南充師院學報》1987年第1期。

73 鄭傑祥，《夏史初探》（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96-97。

74 陳昌遠，〈商族起源地望發微〉，《歷史研究》1987年第3期。

75 鄒衡，〈試論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頁159；〈關於探討夏文化的幾個問題〉，《文物》1979年第3期。

76 李伯謙，〈先商文化探索〉，《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77 張光直，〈新石器時代中原文化的擴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2分，1970年；〈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繼續探索〉下篇〈商文明〉，《考古學參考資料》第1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78 王克林，〈略論夏文化的源流及其有關問題〉，《夏史論叢》（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

78 安志敏，〈試論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

80 高廣仁、邵望平，〈中國史前時代的龜靈與犬牲〉，《中國考古學研究》第1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81 趙芝荃，〈二里頭文化與二里崗期文化〉，《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週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82 程德祺，〈夏為東夷說〉及「補記」，《原始社會初探》（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年），頁228、234。

則虞夏商皆居東土，周獨起於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範九疇，帝之所以錫禹者，而箕子傳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為名，而殷人承之矣。」<sup>83</sup>張蔭麟說，「照傳說的一種系譜（《史記·五帝本紀》），他（黃帝）是堯的高祖，舜的八世祖，禹的高祖（舜反比禹低三輩，這很奇怪），也是商周兩朝王室的遠祖，並且成了後來許多向化的外族的祖先。」<sup>84</sup>徐旭生認為華夏集團從西北黃土原上東遷走到中原地區，同土著的東夷集團相接觸，血統與文化交互錯雜；華夏集團中的高陽氏（顓頊族）所住的地方最東，所以所受影響最多；因為所處地方交通方便，所以文化混合而較高；有虞氏及商人比鄰而居，有虞氏祖祭顓頊，商人禘舜，證明他們一脈相承。<sup>85</sup>范文瀾曾經指出：「古代史書和神話傳說裏，都說夏商周三代世系溯源於黃帝，商周二代同是帝嚳的後裔，儘管細節上有分歧，同屬黃帝族卻絕無異說。」<sup>86</sup>金景芳也認為，「《史記·三代世表》明確地譜列堯、舜和夏、殷、周王室的祖先同是以黃帝為初祖。雖然在細節上不能保證沒有缺漏和訛誤，但大體上說是有根據的，可信的。」<sup>87</sup>李學勤也曾表明：「黃帝是先秦幾個王朝的共同始祖。古書中常見的三代，指夏、商、周，有時前面再加上虞，稱作四代。虞、夏的祖先是黃帝之子昌意，商、周的祖先是黃帝之子玄囂。這樣的傳說表明，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這幾個王朝，雖然互相更代，仍有著血緣以及文化的聯繫。」<sup>88</sup>嚴一萍指出，三代社樹雖有「夏後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之異，但「其有社者一

也。」「縱觀三代文化，縱有異同之處，未逾損益相因，尋其本則一脈相承，未嘗有變焉。」<sup>89</sup>林祥庚著文詳細考證了夏、商、周服制、語言、葬俗、宗教信仰，認為三代世系溯於黃帝，為同一族源；三族在史前時代會結成部落聯盟，存在著同宗血緣親屬關係；三族的圖騰崇拜都與黃帝族有一定的淵源關係；中原仰韶——龍山文化可以作為三族都是黃帝族後裔的考古學依據。<sup>90</sup>唐嘉弘也指出，華夏族的夏、商、周三代出於一根，為同源異流；但是作為三個不同的共同體，他們各有自己活動的基本地域，各有自己祖先歷史的傳說，各有自己的風俗習慣以及社會生活，各自的經濟水平也有差別。<sup>91</sup>孫瑋也認為夏商周三代同源於虞夏部落聯盟，三代的祖先禹、契、稷都是黃帝的子孫；不過黃帝及其後裔都屬於東夷族的血親集團，夏族以龍為圖騰，源於太昊部落；商族以鳥為圖騰，源於東夷少昊部落聯盟中顓頊族系中的玄鳥氏；即商族與夏族一樣起源於東夷民族。<sup>92</sup>

考古學者中也有人持三族同源說，如鄭光和趙芝荃等認為，夏和商是同一文化的前後兩段，只有政權更迭，沒有文化嬗替，沒有必要從二里頭文化中尋找文化的突變；夏、商同源，同起源於二里頭文化及其源頭——河南龍山文化豫西類型。<sup>93</sup>張光直提出早商文化與大汶口或青蓮崗文化晚期花廳遺址有很多共同因素，並論斷雖然二里頭文化確為夏文化，但早商文化實在也是夏文化，「夏世即商世」，中國古代夏、商、周三代實在是一氣呵成的歷史發展。<sup>94</sup>李民、張國碩詳細論述了夏、商、周三族同源的觀點：三族都屬於華夏集團，最

83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卷10（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84 張蔭麟，《中國史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13。

85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年），頁86。

86 范文瀾，《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頁235。

87 金景芳，《中國奴隸社會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3。

88 李學勤，〈炎黃文化與中華民族〉，《炎黃春秋》總第8期。

89 嚴一萍，〈夏商周文化異同考〉，《大陸雜誌》特刊，1951年第1期，頁394。

90 林祥庚，〈黃帝與夏商周〉，《學術月刊》1985年第1期。

91 唐嘉弘，〈關於華夏族——漢族先民的形成問題〉，《先秦史新探》（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84。

92 孫瑋，〈商族起源新探〉，《安徽史學》1999年第4期。

93 鄭光，〈二里頭遺址的性質與年代〉，《考古與文物》1988年第1期；趙芝荃，〈試論二里頭文化的源流〉，《考古學報》1986年第1期。

94 張光直，〈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個關鍵問題〉，《中國青銅時代》（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

早發祥地是在現今的晉陝豫鄰近的地區，亦即汾、渭、河、洛諸水匯流的中心地域，共同生活於黃河流域；他們在不同的地域先後進入到奴隸社會，在文化發展上互相影響、互為促進，文化面貌有一定的一致性；三族又互相臣屬，商周二族在夏王朝中發展，夏周二族又在商王朝統治下生活，而夏商二族又在周王朝統治下延續，最終融為一體；從考古學分析來說，認為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廟底溝二期文化時期，在晉、陝、豫三省相鄰地區，已形成一個統一的部落聯盟；至龍山文化時期，該地區形成了一個酋邦聯盟，堯、舜、禹都曾為這個酋邦聯盟的首腦；而三地不同的龍山文化類型，即為不同酋邦的文化遺存，其中陶寺類型為堯、舜二酋邦的文化遺存，客省莊二期文化的東部類型為商契酋邦的文化遺存，河南龍山文化的王灣類型為夏禹酋邦的文化遺存；所以夏族起源於豫西，商族始源於關中東部，周族始源於晉南，三族後來按不同的方向發展遷徙，形成三族共主中原的局面。<sup>95</sup>

## 八、江浙說

衛聚賢曾主張商起源於江浙說，認為殷商本為南方民族，在江浙時文化已達到了一定高度，由東南沿海北上至中原，打敗武力較強的夏王朝，成為中國文化之傳播者。<sup>96</sup>

後來張光直的一些看法則可以看作是對這一觀點的重新解釋。「良渚文化新發現的許多象徵性的物事，指向一個巫師的宇宙觀，這個宇宙觀顯然是殷商宇宙觀的前身。……從地理上看，殷商和良渚文化之間還有很大的空間，而這個空間之內還有許許多多的空白。將來的考古工作將這些空白填充了以後，相信巫師文化很可能籠罩著整個中國東海岸。」為此他還設想了這種文化發展遷變的路徑：「從中國東海岸和河南腹心地區聯繫起來，從古到今都是最好的一條通路，便是由江蘇北部逕

直向西，經過徐州和商邱，略向北彎，經過開封與鄭州相會。這條路也正是今天隴海鐵路的路線。……位於東海岸與河南腹地之間的商邱，從地理上說正好是那從東海岸進來建立中國第一個巫師王朝——殷商的最早的國都。」<sup>97</sup>

綜上所述，儘管學術界對於商族起源地望及考古文化的指認千差萬別，但大致可以歸為以上諸幾大類。在這些研究中，早期的研究有的是僅從歷史文獻的考證而得出的結論，也有的是僅從文字音韻訓詁的角度推測。但新時期的研究大都結合了考古學文化的分析與研究，使得這一研究有了更為科學和實證的性質。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這些研究中，學術界明確提出了先商文化這一概念，並將先商文化分為漳河類型、輝衛類型、南關外類型等。<sup>98</sup>這為在考古學文化研究基礎之上探尋商族源頭搭建了一個平臺，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對於先商文化的確認和商族起源的研究，之所以見仁見智，異說紛呈，而且大多具有一定的立論根據，具有相當程度的可信性，主要是由於文獻記載本身就有許多歧義之說，考古學文化之間的交流、影響的結果又使得它們相互之間有一些文化因素的相似性和繼承性，論者各取利於自己觀點的文獻記載，又局部地看重某些考古文化因素的類似和傳承，所以，各家學說經過多年來眾多學者的補充與完善，都達到了足備一說的水平。這樣一來，只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以至於難以得出一個關於商族起源的統一且正確的看法。

但是這種百家爭鳴的局面，至少有以下幾個積極可取之處：其一，關於相關古文獻的考證更加豐富、更加縝密，為今後進一步研究這一課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其二，這一題目的研究促進了各種考古學文化及文化之間的交流、影響、同異因素的分析，這不僅對進一步研究這一題目有利，而且對於考古學研究本身而言也是一種積極的成果。其三，通過比較激烈討論的各種學說，

95 李民、張國碩，《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見「內容提要」和「序言」部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96 衛聚賢，〈讀殷商民族發源地質疑後〉，《學術月刊》第1卷第2、3期，1933年版；〈殷人自江浙遷徙於河南〉，《江蘇研究》第3卷第5、6期，1937年版；〈中國文化起源於東南發達於西北的檢討〉，《東方雜誌》第34卷第7期，1937年。

97 張光直，〈商名試釋〉，《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頁112。

98 鄒衡，〈試論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使我們看清了哪些觀點佔優勢，哪些觀點占劣勢；某一觀點中哪些部分合理，哪些部分不合理，這就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可選擇利用的素材。

應該注意的是：其一，由於先秦文獻史籍的匱乏，關於先秦的史料大多是漢晉唐學者的追記。如果我們在意這些史籍的可靠性，那麼就不難發現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甚至同一學者在不同場合對同一上古事件的追記，往往會有不同之處。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尤其當研究某人某事發生於何地時，你就會碰到這種難以下手的情況，無所適從。文獻史料固然不可或缺，然而它有很大程度上的模糊性，不可定性。因此研究上古史，包括商族起源，如果純粹利用文獻的考證和推導，恐怕不利於得出科學的結論，不利於問題的解決。要研究商族的起源，必要的文獻考證之外，必須有考古學資料的證實。重視和借鑒利用考古學家做出的認真嚴密的考古學學術成果，是唯一的正途。其二，古代民族多是經常遷徙不定的部族，商族也不例外，因此先商文化的物質

遺存，不可能完全表現為平面分布的連續和地層分布的連貫，某些地望的突變、地層的缺環都是可能的，文化內涵也定然會因為吸收較多的周邊民族文化而出現某些變異。所以關於商族起源的研究應該是動態的考古文化分析，而不能只是靜止、孤立地做文獻地望考究。其三，正因為商族是一個遷徙的部族，推測其部族初起之時應是遊牧民族。因此商族最早階段的活動地域不可能遺留下很多的考古學文化遺存。今天的考古發掘情況也證實正是這樣：現在所謂的先商文化也只是這個民族勢力達到某種程度，物質文化生產有一定規模的遺存。那麼，這就給探索商人祖先最早的居住地帶來了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必要的考古學文化因素的上溯追尋外，又要回過頭來借助於文獻記載。先商文化分布區域內有關殷商先人活動情況的文獻記載，正可彌補這種缺陷。這種文獻與考古相結合的正確方法，相信能夠推證出商族起源的最終結論。

## 漢學研究中心出版品

### 朱子學的開展

東亞篇

### 朱子學的開展

學術篇

### 朱子學的開展——學術篇

漢學研究中心叢刊 論著類第8種

鍾彩鈞主編／漢學研究中心編印

定價：新臺幣 350 元（國內）、美金 15 元（國外），含郵資

### 朱子學的開展——東亞篇

漢學研究中心叢刊 論著類第9種

楊儒賓主編／漢學研究中心編印

定價：新臺幣 350 元（國內）、美金 15 元（國外），含郵資

內容：本套書為漢學研究中心舉辦「朱子學與東亞文明研討會」之論文集。